

跨越兩個年代

——評閻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 許紀霖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80年代以來，大陸史學界一直在探索傳統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可能性。儘管在形而上的觀念和方法層面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作為一種新的研究範式，最重要的還是要有經驗性的成功範例。在為數有限的範例之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閻步克所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也許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

本書研究的是從周代到東漢中國士大夫政治從萌芽到定型的歷史過程。有關這一課題，前人已積累了一定的相關研究成果。閻步克開始從事這一研究，正好是80年代中後期的新啟蒙運動時期。作為「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之一，他顯然受到了當時氛圍的感染。在本書的後記中，作者充滿感情地談到：本書的主要方法、思路和結構，都形成於80年代；人們或謂80年代是「思想的年代」，不無浮躁和膚淺，「然而我對80年代思想界那種熱情和勇氣、那種求新求異的蓬勃精神，總是抱有不絕如縷的懷念和認同；即就風格而言，假如將此書歸之於『80年代』範疇的話，我並無異辭」。

80年代贈予作者的又是甚麼呢？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鮮明的問題意識。從一開始，閻步克對士大夫政治就有其獨到的歷史關懷和觀察視角。他將士大夫政理解為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他所關心的中心問題是：這樣一種政治文化，是如何在中國文化及其文化承擔者那裡歷史地建構起來的？在80年代，知識份子問題曾經是思想界備受關注的公共問題，閻步克最初的思路也是從「古代知識份子」切入，逐漸轉移到其與士大夫政治的歷史關係。因而，他更多地是從「士大夫」這一角度討論「士大夫政治」的。作者發現：在這一政治文化中，「文人角色與官僚角色分別都有了相當分化，同時二者又緊密地融合為一種『士大夫』形態，並且達到了賴文森所謂『最高文化價值與最高社會權力的輝煌的象徵性結合』」。

於是，「社會分化」成為本書的一個核心概念。顯然，這一來自社會學的分析性概念，是80年代贈予作者的最重要禮物。將社會科學的分析性概念運用於人文學科，最忌諱之處在於簡單地套用，作外在化的圖解。事實上，當年不少學者在這方面探索的失敗，皆與此相關。然而，閻步克對此卻作了相當認真的知識準備。他研讀和翻譯了美國結構功能主義大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不少原著，並且將「功能」這一共時性的社會學分析方法，內化為一種歷時性的歷史學概念，以此作為中介，分析中國士大夫從分化到整合的複雜歷史過程。如果說，閻步克在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話，那麼，社會科學方法的「內化」是很值得重視的經驗。

借助「社會分化」這一核心概念，作者揭示了從周代到東漢，中國士大夫經歷了一個由「合」到「分」、再到「合」的歷史演化過程。西周、春秋宗法時代，有一個封建貴族的士大夫階級，他們集政治功能與文化功能於一身，是後來帝國時代士大夫的前身。到戰國時期，從士大夫階級中分化出學士和文吏兩種社會階層，他們分別承擔了文化創造和行政管理兩種不同的功能。隨著大規模變法運動的展開和秦朝的建立，文吏最後壓倒了儒生，成為帝國的統治基礎。西漢皇朝汲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訓，開始兼用學士和文吏。最後到東漢二者重新合流，形成了帝國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綿延了近兩千年的中國士大夫政治遂由此定型。

韋伯（Max Weber）曾經認為，中國歷史上缺乏一個現代的官僚階層。本書對歷史上曾經風光一時的文吏階層的重新確認，事實上否證了韋伯的不確之詞。但由此也引起了作者的困惑：為甚麼頗具專業統治能力的文吏政治竟然是二世而亡，而那種缺乏專業化角色的士大夫政治，在中國卻顯出更強大的生命力？——這的確是一個更為重要、更有價值的問題，閻步克對此的解釋是：這可能與中國的「禮治」文化傳統有關，片面發達、片面分化的官僚體制不足以整合社會，而由學士群體促成的士大夫政治，一方面深深地紮根於宗法的傳統之中；另一方面，官僚文人的高級文化教養又能夠賦予帝國體制一種獨特的文化感召力，使得帝國與社會文化傳統通過士大夫政治得以整合。應該說，作者的解釋是有說服力的，但他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對於全書來說具有更重要、更核心的位置，因而也只是順便點到為止，對此的回應也比較零碎，未曾詳細展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一缺陷影響了本書的分析深度，而上述問題，也成為本書最終未能在規範或事實層面得以圓滿解決的懸案。

儘管如此，本書在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方面所作的成功努力，依然令人敬佩。外來方法論的「內化」，最終是要尋求中國歷史演變的內在理路。而內在理路的疏理，不能僅僅憑藉西方的分析性概念，而必須從中國固有的歷史概念裡面去尋求。在這方面，閻步克表現出他對傳統應有的尊重。他在具體借用西方分析概念時，表現得格外的慎重，更多地還是從中國傳統的自身範疇（如「政統」、「親統」、「道統」、「吏道」、「師道」、「父道」等）中，尋求其內在理路。另一方面，雖然在整體分析架構和理念預設上，帕森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並不因此而替代了具體的史學考證。受其業師田餘慶先生的影響，作者在功夫論上無疑繼承了乾嘉學派嚴謹的治學傳統。

在大陸知識界，近年來經常出現這樣的現象：公共思想界重視的、有突破的著作，往往被專業學術界不屑一顧；而在專業圈被承認的厚實之作，又被思想界認為缺乏公共價值。但本書卻是一個兩邊都喊好的例外。箇中原因也許就在於，西方社會科學的整體分析框架與中國史學傳統在本書中獲得了某種內在的融合。這一成功多少預示著中國新史學某種令人鼓舞的發展方向。同時，我們也從中發現，所謂80年代與90年代、思想與學術的斷裂，並非是絕對的。這本構思於80年代、成書於90年代的跨越之作，實際在暗示我們：思想與學術、兩個年代之間，並非沒有溝通的可能。